

大国关系丛书



唐永胜 郭新宁 著

角逐亚太

江苏人民出版社

唐永胜 郭新宁 著

角逐亚太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角逐亚太
著 者 唐永胜 郭新宁
责任编辑 彭晓路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5 插页 2
印 数 1—6 100 册
字 数 218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420—9/D·368
定 价 1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西方霸权面临挑战	1
从另一视角看“文明冲突论”.....	2
西方相对衰落——历史发展之必然.....	6
西方仍在与命运抗争	14
第二章 天平向亚太倾斜	22
风景这边独好	22
亚太崛起之谜	28
矛盾、斗争与相互依存.....	32
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与启示	38
世界经济政治中心东移并非子虚乌有	46
第三章 亚太的冲突与合作	55
新格局的雏形	55
是否存在并行不悖的康庄大道	58
国家利益的实现与维护	64
利益交汇的亚太	70
第四章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美国	81
从赫尔姆斯—伯顿法说起	81
托钵僧岂能独宰世界	85
美国寄厚望于亚太	91
“新太平洋共同体”——痛苦的单相思	97

第五章 不甘寂寞的日本·····	11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110
“经济日本”要做“政治大国”·····	113
日本在国际体系中难以找到确切的位置·····	119
第六章 雄心未泯的俄罗斯·····	126
从“一边倒”到“双头鹰”·····	126
帷幕拉开前路仍艰·····	140
第七章 悄然崛起的东盟·····	148
“龙”腾“虎”跃竞发展·····	149
团结就是力量·····	161
国际舞台的奇观——小国左右大国·····	168
第八章 纠缠不清的双边关系·····	172
一个难解的结——中美关系·····	172
中日能否携手进入 21 世纪·····	187
同床异梦的“夫妻”——美日关系·····	196
无法亲密的伙伴——美俄关系·····	207
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伙伴——中俄关系·····	221
日本对“北极熊”疑惧难消·····	234
第九章 难以把握的三角关系·····	247
谁来主导亚太·····	247

之所以称为三角·····	250
中美俄三角取代中美日三角主导地位的 可能性·····	255
第十章 中国不是旁观者 ·····	262
东方雄狮的觉醒·····	262
亚太——中国的立足点所在·····	265
面向 21 世纪的机遇与挑战·····	275
第十一章 亚太的未来 ·····	280
共同利益的增加及其变数·····	283
相互依存、相互竞争与机会有限·····	288
求同存异才有前途·····	294
后 记 ·····	298

第一章 西方霸权面临挑战

当历史即将合上沉重的 20 世纪最后一页,翻开令人神往的 21 世纪新的篇章之际,人们会发现人类文明史仿佛正在演绎着佛教教义中所宣扬的“轮回”。欧美各国领袖们争先恐后地前往亚太地区,他们不是去朝圣,也不是为了取经,而是为了使亚太地区创造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折射,从而使本国也能够从亚太经济发展与繁荣中获益。曾经孕育过灿烂的华夏文明和古印度文化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简称亚太地区)不可逆转地从酣睡中苏醒了。60 年代,日本创造了经济奇迹,率先步入发达国家行列;70 年代,“亚洲四小龙”克服了先天不足,实现了经济腾飞;接着,70 年代末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迅速成为地区经济新的增长点,并为亚太地区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到了 90 年代,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亚太国家也在探索适合本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争取搭上地区经济发展的快车。亚太各国经济发展赶超型的态势使得地区经济显示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成为 70 年代以来步履蹒跚的世界经济中的一颗闪亮的明星,也使世界其他地区感到羡慕,当然也许有些国家会感到失落甚至妒忌。

亚太崛起的冲击波激荡着全球每个角落,改变着已经延续了近五百年的由欧美唱主角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中恳切地向西方呼吁,“全面

角逐亚太

承认并且接受东方的时代已经到来。这种接受就和当初接受地球是圆的这一事实一样意义深远。”在又一个千年即将来临之际，几乎每一个关心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人竞相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大西洋时代是否已经或正在寿终正寝？或者，太平洋时代能否取代大西洋时代？

从另一视角看“文明冲突论”

1996年8月21日，英国下议院外交特别委员会主席戴维·豪厄尔在《独立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发出惊世之语，他说：“欧洲必须为东方化作好准备。”他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实行西方化，而是实行东方化。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但在采纳现在蒸蒸日上的这些亚洲富有活力的国家的实业技术方面，而且在采纳它们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成功背后的某些价值观念和态度方面，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豪厄尔这席话显然并非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反映了一种承认现实并接受现实的坦诚态度。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中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欧美国家的影响力在不断下降，五百年以来一直在欧洲的影子中生活、后来又在美国的影子中生活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逐步走出阴影，迈上自强自立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继取得政治独立后，通过探索寻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西方应该重新审视自己，为自己重新定位。

1993年，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一个轰动一时的命题——文明冲突论，曾经引起国际学术界及各国政界的广泛关注。他在这一命题中指出，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

全球性政治冲突将主要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和集团之间。人类最大的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的差异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因此,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形式。在亨廷顿先生看来,未来世界将形成三大文明圈,即基督教文明(西方文明)、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而这三大文明圈不可能并行不悖地平行发展,摩擦与冲突在所难免,其中儒教文明对西方文明将产生巨大的冲击。鉴于此,亨廷顿鼓吹西方基督教世界联合起来,对付非西方的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

亨廷顿的理论显然与世界经济政治的客观现实相差甚远,至多也只能说它仅是一家之言。姑且不论亨廷顿先生这一命题是否完全符合当今世界的客观现实以及能否为未来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所证实,从另一角度上看,它至少在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承认了以下两点:

第一,西方文明不可能成为未来世界唯一的价值取向。与西方某些学者和政客不同,亨廷顿承认“在当代世界中,大多数现代社会是西方社会。但是,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西方人认定其他现代化民族必然变得和西方自身一样的想法是西方人的傲慢自大”。他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一书中指出,关于“世界正朝着同一化、亦即普遍西化的方向发展”的论点,“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误导,是傲慢的、错误的和危险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既不需要,也不会造成西方化,相反,它们将促进本国文化的复兴,并且带来努力发展本国文化的新决心”。他以日本、沙特和新加坡为例加以说明,它们“是现代的、繁荣的社会,但它们显然是非西方化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上述三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在本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过程中完成的,尤其是沙特和新加坡,一个迄今仍是伊斯

角逐亚太

兰教色彩相当浓厚的阿拉伯国家，一个则是集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科技、经济管理及某些政治文化于一体的儒教国家。日本虽然自明治维新以来曾奉行“脱亚入欧”和“脱亚入美”的政策，但是已经跻身于资本主义强国之林的日本从本质上说更像是一个儒教国家。因此，“西方期望它的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但全世界势不可挡的本国化潮流是对这一期望的一种嘲讽”。

显而易见，亨廷顿认识到西方文明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选择。可悲的是，他并不像豪厄尔那么坦然地对待非西方的崛起，所以他没敢继续往下推演，因为他不可能、也不愿意摆脱“西方文明优势论”的窠臼。不仅如此，亨廷顿为了维护西方文明的一统天下的地位，还提出了十条对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加强西方文明内部的联合与合作；把文化接近西方的地区纳入西方轨道；限制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军事力量的扩张；缓和削减西方军事力量的势头，在中东和西南亚保持军事优势；充分利用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冲突等等。这恐怕只能是亨廷顿先生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而已。

亨廷顿满怀希望地提出建议，“西方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的欧洲发展与扩张阶段和一个统治了本世纪的美国阶段。如果北美洲和欧洲恢复其道德生活，增强其文化上的共性，并发展更加紧密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形式，用以补充它们在北约组织中的安全协作，它们可能产生一个具有西方富裕和政治影响的第三个阶段，即欧美阶段”（引自《文明的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这一建议存在现实可能性吗？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确实也存在协调与合作的一面，但它们之间的矛盾似乎发展得更快，如果要以维护西方文明优势地位为由发起又一次十字军运动，比起维护西方各国自己的国家经济、政治及其他利益，其号召力就太小了。以西方各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为例，海湾战争结束后，美英等

国竭力维持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但是法国却我行我素,主张放宽甚至取消对伊制裁。伊拉克正是利用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对它们进行分化瓦解,终于实现了重新出口石油的目标,为摆脱国内深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创造了条件。可见,亨廷顿所提的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对策都难以实现,更毋需谈其他对策了。

第二,世界经济政治由欧美主宰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亨廷顿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现代世界冲突演化过程中的最新阶段。此前,从标志着现代国家体系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四十多年你死我活的激烈争斗,世界上所发生的重大冲突,基本上都属于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走出了由西方一手遮天的漫长岁月,而未来世界政治的轴心可能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以及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权力和价值的反应。非西方国家和文明不甘成为历史的奴仆和西方殖民主义的目标,而是要与西方一起共同成为历史的推动者和构造者。亨廷顿在为其命题辩解的一篇文章《不是文明是什么?》里悲叹:“西方的权力在 19 世纪以欧洲殖民主义的形式,在 20 世纪以美国霸权形式将西方文化扩展到了当代世界的许多地方。欧洲殖民主义业已终结,美国霸权正在消退,西方文化的衰微接踵而至。而那些植根于本土的、历史的习俗、语言、信仰和体制则卷土重来……西方权力的衰落会伴随,也正在伴随西方文化的退却”(载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1993 年第 5 期)。其命题的最后论点是,文明冲突将会取代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全球占主要地位的冲突形式,因为非西方文明将扮演主要角色。先不去论证这一观点是否能够站得住脚,亨廷顿毕竟已经意识到西方在未来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必然走向衰落这一趋势。

角逐亚太

亨廷顿既是一名学者，也是一位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谋士，他是为维护西方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主导地位(确切地说是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为基本出发点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他从内心里并不希望看到西方文明和西方价值观不再为非西方世界接受，更不愿意看到美国从权力顶峰跌落下来，但“文明冲突论”却将无情的现实摆在西方人的面前，反映出西方学术界确实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危机感。

西方相对衰落——历史发展之必然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约五百年的世界近现代史是一部欧美列强进行你死我活的争霸斗争的历史，充满了血腥与恐怖。西班牙“无敌舰队”曾经称雄大西洋两岸，使拉丁美洲广袤的土地变为西班牙王室的采邑，这里的黄金和白银支撑着西班牙王室腐朽糜烂、醉生梦死的生活；荷兰“海上马车夫”接着确立了连接东方与西方的海上航线的霸主地位，东方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海牙和阿姆斯特丹，成为荷兰早期工业化的原始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1588年，英国海军击败“无敌舰队”，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基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也走上了争夺欧洲大陆乃至世界霸权的道路，北非和东亚大片地区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德意志帝国19世纪60年代实现统一，野心勃发，大肆扩军备战，旨在向英法居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体系发出挑战，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策源地；17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使俄罗斯迅速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走上侵略和扩张的道路，它贪婪地吞并中亚和远东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土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主要在欧美国家之间发生，数亿生灵惨遭涂炭，亿万财富化为灰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展开

了角逐,疯狂的军备竞赛,尤其是令人恐怖的核军备竞赛使“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人类项上。

在欧美列强争霸世界的五百年中,国际关系为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和强权政治所主宰,而非西方地区则只能成为俎上鱼肉,任由西方宰割。非洲分别沦为英、法、德、葡、西、意的殖民地;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部分沦为英法俄殖民地,部分变成半殖民地,还有一部分落入帝国主义国家的虎口;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法国瓜分了拉丁美洲;就连太平洋上的岛屿也没能幸免,夏威夷女王被迫退位,其王国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所罗门群岛土著居民变为英国女王的臣民,等等。

够了!早应该结束了!西方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应该结束了!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已经在东方尝到苦头。二战结束后,美国自认为其“天定命运”是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在欧洲拼凑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其称霸世界的障碍——苏联,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最终,两超之争以苏联解体而告终。这一结果着实让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高兴了好一阵子。其实,苏联的解体绝非美国式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或经济政治制度的胜利,而是苏联战后采取的极其错误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过度的对外扩张使相对滞后的国民经济不堪重负,导致的可悲结局。在东方,美国企图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越南和朝鲜扼杀于摇篮之中,在这些国家的周围构筑了一条“新月形”包围圈,并对它们实行严格的经济贸易封锁。在上述措施未见奏效的情况下,美国铤而走险,在东亚地区卷入了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然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经济、政治和军事超级大国却大失体面地栽在那里,不得不头一次在没有打赢的停战协议上签字。

角逐亚太

美国的二战英雄克拉克在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时的情绪非常沮丧低落,不仅因为他是一个战败了的美国将军,而且是因为他痛苦地认识到美国根本就不该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最近在其专著《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里打破了自己对越战近30年的沉默,他在书中总结了越战悲剧的11条主要原因,其中第3条和第8条教训分别是:“我们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它们可以鼓动人民为他们的信仰和价值去战斗,并付出牺牲。今天,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我们仍然在重复着类似的错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领袖,都不是万能的。在不涉及我们自身存亡的事务中,要判断什么是另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应由国际社会进行公开的辩论来决定。我们并不拥有天赋的权力,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理想或选择去塑造任何其他国家”。美国在东亚碰了一鼻子灰是偶然的吗?绝对不是。东方这个近代史开始以来一直任由西方蹂躏和践踏的落后地区已经从沉睡中惊醒,并且开始了改变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麦克纳马拉这番沉痛而中肯的反思应该足以使西方某些头脑依然发热的所谓战略家警醒。但不幸的是,他们仍在我行我素。

1915年,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在80年后的今天,学术界有些人认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趋于均衡化,因而列宁的这一论断似乎已经过时。其实,只要认真分析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的现实便不难看出,不平衡发展规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具有现实意义。

从全球角度上看,当今世界仍然是资本主义占绝对优势的世界,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必将继续存在,其集中表现就是处于

领先地位的西方发展相对迟滞,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地位相对衰落,而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则在加快步伐,甚至呈跳跃式发展态势,逐步接近、赶上,以至超过发达国家。

让我们首先从战后南北经济差距变化入手进行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30年里,大批亚非拉国家挣脱了西方的殖民统治,走向政治独立,同时也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有些国家试图模仿欧美国家的经济制度,有些国家照搬苏联经济模式,也有一些国家则选择了介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间的发展道路。在此期间,发展中国家起点很低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有些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南北差距出现了缩小的迹象。到了70年代,在“石油危机”发生以后,发达国家经济普遍陷入“滞胀”困境,增长乏力,而发展中国家却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南北差距进一步缩小。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阻碍和限制,加上不少发展中国家自身也出现领导失误、政策失当之处,所以进入80年代,南方一部分国家经济发展遇到严重困难。其中不少国家陷入以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为主的经济危机,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但在这“失去的十年”里,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尤其是以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为中心的经济调整,为后来经济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初见成效,呈现出勃勃的生机和活力。

1990~1994年,在世界经济全面不景气的不利情况下(世界经济年增长率仅为1%),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5%左右,其中1994年高达5.5%,同期发达国家经济年增长率不足2%,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总的发展水平开始起到牵引作用,而发达国家的火车头作用似乎有所下降。下表

角逐亚太

反映了 7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较。其中将东欧列入发展中国家,它们明显拖了整体水平的后腿,而且从地缘上说也似乎不太顺,它们应该属于欧美国家。如果不将它们包括在发展中国家之中,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肯定还要更高一些。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比较

单位:增长率%

国家或地区	1974—1993	1994—2003
发达国家	2.9	2.7
发展中国家	3.0	4.8
其中:		
东亚	7.5	7.6
南亚	4.8	5.3
拉美	2.6	3.4
东欧	1.0	2.7
南部非洲	2.0	3.9
中东北非	1.2	3.8

- ① 东欧包括前苏联地区。
- ②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1995 年年度报告。
- ③ 1994~2003 年数据为预测。

从上表可以看出,从 70 年代中至 90 年代上半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仅仅略高于发达国家,而此后十年里,发展中国家经济将飞速发展,如果将东欧和前苏联排除,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将在 5.5% 以上,而发达国家年增长率约为 2.7%,不及发展中国家的一半。如果今后按此趋势发展下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所占比重将发生变化,从 1994 年的 73% 和 20% 变为 2003 年的 70% 和 2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将由 1994 年 15.7:1,缩小到 2000 年的

14.6:1,到2010年再缩小到13:1。这就预示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高也反映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它们首先从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体制入手,反对西方强加给它们的极不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体制。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根据第三世界国家的倡议,专门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会议通过了七十七国集团起草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它们体现了第三世界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经济利益,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剥削和掠夺的正义要求。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迫使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体制中作出重大让步。尤其是70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组织利用“石油武器”迫使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甚至政治上作出妥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后的斗争增添了信心。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西方国家也在分化,一些国家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意识到如果忽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或者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最终可能危及自身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的马赫布卜·哈克在其所著的《第三世界与国际经济秩序》中尖锐地指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关系极不平等,这一情况正迅速成为当代的中心问题”。联邦德国前总理威利·勃兰特也惊呼:“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正经历着一场危机。这场危机非常危险,其危险性似乎日益严重,我们认为,人们没有充分地认识到那条分隔富国和穷国的鸿沟是这场危机的主要因素,这条鸿沟很深,鸿沟两边的人似乎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因此,“南北对话不仅本身是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出了行动号召。……尽管我们的经历和政治立场大不相同,处理这些问